

图书馆学理论道路的迷茫、艰辛与光荣

——中国图书馆学暨《中国图书馆学报》六十年

范并思

摘 要 中国当代图书馆学自 1956 年起步,经历了 60 年艰难的发展。本文通过对《中国图书馆学报》及其他刊物已发表论文的分析,揭示中国图书馆学 60 年的发展道路和取得的成就。文章将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置于历史环境和国际环境中,分迟到的起点、持续的徘徊、艰难的起步、漫长的重建、迷茫中破局、新世纪的理论光辉等不同阶段,考察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的历史进步。参考文献 29。

关键词 图书馆学基础 图书馆学史 中国图书馆学报

分类号 G250.9

A Review of the Theory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1956–2016

FAN Bingsi

ABSTRACT

Contemporary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has gone through 60 years' tough development since the starting point in 1956. This paper tries to disclose the journey and achievements of Chinese Library Science and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in the past 60 year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published journal articles. This paper analyzes Chinese contemporary Library Science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Library Science history and the international Library Science environment. By exploring the theoretical starting point and the phases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Library Science, the paper determined the starting point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Library Science was 1956 and divided the history into 5 phases; then the progress of each phase was studied. The features of 5 phases could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957–1966 was a wandering phase for Chinese Library Science. The research highlights of this period were the theoretic foundation of Library Science, the union catalog and the library classification. But comparing these achievements with those of New Library Movement or international Library Science in the corresponding phase, the gap between Chinese Library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Library Science was enlarged.

1973–1978 could be called the tough starting period. Late “Cultural Revolution” achievements like MARC by Liu Guojun and subject indexing by Qiu Feng narrowed the gap between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1979–1991 was the phase of theoretical rebuilding for Chinese Library Science. It c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periods as recovery of empirical Library Science, critics of empirical Library Science, and formation of

通信作者:范并思,Email:bsfan@infor.ecnu.edu.cn,ORCID:0000-0001-8808-8139 (Correspondence should be addressed to FAN Bingsi,Email:bsfan@infor.ecnu.edu.cn,ORCID:0000-0001-8808-8139)

new-type Library Science. Chinese Library Science realize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empirical description to scientific spirit, from micro to macro field, from critical research to building research, from unitary to a diversified theoretical structure.

1991-2001 is the breaking period for Chinese Library Science from a lost situation. In the 1990s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had a strong impact on the library values, and the Library Science lost its way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future, which made the 10 years the toughest period in the Chinese Library Science history. The publication of the series of dialogues between Wu Jianzhong and international library scholars were regarded that the Chinese Library Science had already undergone the low-level communication only via literature transl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languages. The overwhelming concern about the digital library technology made the IT research become an organic part of Chinese Library Science.

2002-2016 is the shining period of Chinese Library Science theories.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period had three characteristics. The first is that Chinese Library Science promoted the new library values such as the universal access and openness, fair service, free service, and central-branch library system, which lead Chinese public libraries to the revolution on policy, management and service. The second is that the Chinese Library Science was involved in the 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 library research and even took the lead in some research areas. The third is the Chinese Library Association created the working pattern which is similar to library association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i.e., leading the library industry engaging in theoretical research by organizing the academic activities.

Although Chinese Library Science still could not export its theories, thoughts and ideas, we expect that it could be part of members of international Library Science and could contribute to the library theories. 29 refs.

KEY WORDS

Theory of Library Science. Library Science history.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0 引言：迟到的起点

近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图书馆学，由于1937—1949年间战争的分割，形成特色迥异的两个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949年，一般被当成第二个阶段当代图书馆学的起点。1949年战争结束，建设时期开始，图书馆事业恢复并快速发展。但图书馆事业发展并未直接带动理论的发展。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领域，1949到1956年间，除了杜定友一部科普性的《新图书馆手册》，几乎没有可以让人提及的成果。

1949—1956年间图书馆学停滞不前的原因在于当时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环境。洪范五

（洪有丰）的命运也许就是这一时期理论家的真实写照。洪范五是著名的图书馆活动家和理论家，1925年任中华图书馆协会首届董事部董事，首届董事部15名成员中有梁启超等12位民国政要或名流，洪先生是其中的3名图书馆学家之一。1949年4月，时任国立中央大学图书馆主任的洪先生没有随学校一起撤离，选择留在南京。洪先生成为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并成为南京文物保管委员会成员，协助新生政权接管文物的工作。但不久洪先生等一大批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受到怀疑或冲击。1951年洪先生离开南京进入苏州的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学习。一年的学习内容已无从可考，从洪先生学习期间留下的数十页交待材料，读得出那一代人的无奈。学习结束后洪先生无法在南京继续工作，

1952年只身调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洪先生的简历中填着副馆长职务,实际上直到1956年初,洪先生一直在管理阅览室。

1956年,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发表,洪先生等知识分子终于盼来了重新为国效力的机会。华东师大一位校领导“碰巧”去图书馆,在阅览室惊讶地认出大牌教授洪范五。于是洪先生正式出任副馆长。1956年12月中国图书馆学会筹备委员会成立,沈祖荣和洪范五这两位首届中华图书馆协会董事部董事重回图书馆学最高舞台,成为筹备委员会成员。

无论史学家们如何褒扬1949—1956年间的图书馆学,我相信在图书馆学家经受着流放和屈辱的年代,不会有真正的图书馆学。1956年才是中国当代图书馆学的起点。1956年,全国图书馆工作会议和全国高等院校图书馆工作会议相继召开,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的科学讨论会和南京图书馆第一届(全国)图书馆学科学讨论会相继举办,《人民日报》发表《向科学进军中的图书馆工作》的社论,中国图书馆学会筹备工作启动。因为战争和政权交替中断将近20年的中国近现代图书馆学,终于重新启动。

1957年创刊的《图书馆学通讯》,即今天的中国图书馆学会会刊《中国图书馆学报》,伴随着当代中国图书馆学前行中的迷茫、艰辛和荣光,走过了整整60年。

1 1957—1966:持续的徘徊

1956年中国图书馆学重新起步后,1957年开始,图书馆学家们的研究成果通过《图书馆学通讯》《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通讯》《图书馆》等为数不多的几种刊物公开发表。几代图书馆学家一起登上理论舞台,学术刊物上初现理论繁荣。老一代图书馆学家杜定友、刘国钧等,文华一代图书馆学家李钟履、钱亚新、皮高品、毛坤等,新海归一代(即1945年以后回国的学人)陈鸿舜、孙云畴、关懿娴、邓衍林等,新学人一代(1949以后出现的学人)黄宗忠、周文骏、谢灼华、彭斐章

等,都是学术舞台上活跃一时的人物。这一时期最好的时间段是1957年和1962年。这两个时间段的学术论文覆盖了图书馆学的大多数领域。

当时刊物的文章中除了较多的工作研究文章外,通讯类文章占了较大比重。这也是理论起步之初的特征之一。1957年,《图书馆学通讯》刊出一批介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各国图书馆活动的文章。涉及的国家除了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外,还包括美国(《美试验传真借书办法》)、英国(《略论“英国期刊联合目录”》)、丹麦(《丹麦拍摄“开放的书架”文献影片》)、日本(《日本高等学校图书馆概况》)、印度(《印度图书馆界消息》)、印尼(《印度尼西亚的公共图书馆》)等国。这些文章篇幅虽不长,但在当时环境下实属难得。如张遵俭译自《分类与编目杂志》的《杜威十进分类法第十六版编订情况》一文,介绍了杜威分类法十四版引起的学术争议,及十六版的编订者转为美国国会图书馆等重要信息^[1],文章对了解国际图书馆分类法的理论进展具有很重要的价值。稍有遗憾的是,1958年开始,对国外图书馆的介绍又圈定在“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范围了。

这一时期的图书馆学初步呈现理论繁荣,文献中不乏亮点,且一直为后人称道。当时发表的期刊论文中,除了由于特定历史环境导致的批判性文章和时政跟风文章(如向科学进军、大跃进类文章)外,有五个领域的研究较为引人注目:图书馆学基础、图书馆史、联合目录、图书分类和古典文献学。这五个领域中,图书馆学史的代表性研究是谢灼华对“古越藏书楼”的研究,古典文献学的代表性研究是王重民对“七略”的研究,这些研究在后人的总结中多次提及,这两个领域也缺乏可比较的国际背景,本文不再赘述。从中国图书馆学史和国际图书馆学进展这两个视角看图书馆学基础、联合目录和图书分类这三个典型领域,1956—1966年的中国图书馆学,只能说是徘徊不前的10年。

1.1 图书馆学基础

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讨论是一个图书馆学基础理论问题,1957年后刘国钧《什么是图书馆学》引发了不少讨论,使“什么是图书馆学”的研究受到图书馆学史的高度评价。但实际上当时讨论的理论进步十分有限。《什么是图书馆学》提出了“五要素说”,“要素说”产生于1920年代,刘国钧的贡献是将此前的三要素、四要素扩展为了五要素。这种扩展固然属于理论进步,但并不是突破性、颠覆性的进步。更何况《什么是图书馆学》几乎自发表开始即遭到一轮又一轮的批判,微不足道的理论进步成果惨遭破坏。

从国际图书馆学进展看,战后国际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取得极为重要的进展,1952年谢拉创立“社会认识论”,将其作为图书馆学理论基础。1957年兰德赫尔出版《图书馆的社会功能》,创立图书馆社会学。除了这些属于“图书馆哲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外,更为重要的理论进展体现在图书馆职业理念的研究。早在新图书馆运动时期,刘国钧、杜定友、李小缘等人就已经提出图书馆为所有人服务的观点。这些观点在国际上虽然并不领先,但至少跟上了国际潮流。战后国际图书馆界通过公共图书馆社会职能的研究,大大丰富了图书馆职业理念的内涵。1947年,S.H. Ditzion的《民主文化的武器库》第一次将公共图书馆的职能与对社会底层人士的人文关怀联系在一起,深刻揭示了公共图书馆与现代民主政治的关系。1949年谢拉的《公共图书馆基础》、加库的《公共图书馆与政治作用》都阐述了公共图书馆与政治民主的关系,这些理论工作突破了芝加哥学派的图书馆哲学的纯理论范式,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共图书馆宣言》问世奠定了基础。相比同期我国图书馆学基础,图书馆职业理念研究比新图书馆运动时期大步后退,为所有人服务的观点受到批判且无人正面讨论,而公共图书馆与现代民主政治的问题更是无人敢触碰。相比较而言,“什么是图书馆学”的讨论只是在重复1920年代一个学术式命题,远不能使中国图书馆学基础研究缩

小与国际图书馆学的距离。

1.2 联合目录研究

我国图书馆学对联合目录的研究是1957年图书馆学的一个亮点。联合目录研究部分属于目录学研究,当年的论文在目录学领域并没有突破性的创新,但《试论联合目录》中对于多种欧美国家联合目录的介绍和讨论,国外资料之详实,在文革前的图书馆学论文中十分罕见。联合目录同时也是文献资源建设的课题,这是当时联合目录研究的事业发展背景。1957年国务院发布《全国图书协调方案》,成立了北京和上海两个中心图书馆委员会,开始了我国图书馆事业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文献资源共享。建立全国图书联合目录是这一工作的任务之一。毛坤和邓衍林等人对于联合目录的研究着眼于文献资源共享,毛坤认为联合目录的功用之一是“便利图书馆间开展馆际互借工作”^[2],邓衍林更是直接从《全国图书协调方案》的任务开始讨论联合目录,认为联合目录的意义是“充分发挥图书馆资源和潜力”,其功用包括“便利馆际互借和复制工作,发挥全国藏书互通有无的高度利用率和流通量”“协调书刊选购,避免不必要的重复”^[3]。这些研究工作,无论是研究领域的前沿性还是论文本身的学术水准,都超越了新图书馆运动时期的理论水平。

尽管从我国图书馆学发展史看,联合目录研究有明显的理论进步,甚至可以说是取得了重大理论突破。但放到国际图书馆学背景下考察,我国文献资源共享研究与国外的差距却并未缩小。二战结束后,文献资源共享领域出现的最重要变化是由文献共享走向文献共建共享。文献共建的最重要成果是1948年开始执行的美国法明顿计划。这一计划通过联合采购、联合目录和馆际互借,实现了在有限经费的前提下文献的最大保障率。由于当时我国图书馆学研究者无法了解法明顿计划等文献资源共享的最新进展,不能为决策者提供更先进的政策思想,只能听任前苏联专家指导《全国图书协调

方案》编制。《全国图书协调方案》试图通过图书调拨这种完全依靠行政命令、具有明显“一平二调”的手段,来实现文献资源的优化布局,其理论、思路大大落后于法明顿计划。毛坤等人研究联合目录的理论光芒,可以说被淹没在这一缺陷中。

1.3 图书分类研究

1949年以后的我国的图书分类研究一直为图书馆理论界所称道,新中国建立后,各地陆续编制新的图书分类法。新的意识形态确立后,图书分类法势必进行调整和修订,理论家们讨论修订的原则也是必然的,如1951年杜定友对“根据马列主义,确定分类大纲”^[4]的论证。1957年以后,围绕图书分类的理论与实践,讨论逐渐增多,成为一个理论的热点。张德芳讨论图书分类法的编制原则,涉及的问题包括“图书分类与学术分类”“客观原则”和“发展原则”^[5],表现出当时难得的学术理性。有些学者的研究进入图书分类的技术层面,如汪家熔讨论同类书排列问题,分析了著者排列、书名排列和顺序号排列三种排列方式的优劣,主张“根据图书整理工作的科学化、系统化的要求来排列”^[6]。毛坤的标题目录研究质疑图书分类法“落后于现实”^[7],杜定友提出了“在一定范围内充分利用字顺排列法,走向新型的分类主题目录”的图书分类法的路向^[8],引发一场关于分类法发展方向的讨论。

张德芳、毛坤、杜定友的上述研究,较我国早年图书分类法研究有所进步。其实,1930年代我国图书分类研究已经有很高的水准,如子远对杜威法与国会法的比较研究,王晓初对杜威法与卡特法的比较研究,胡延钧对冒号分类法的研究。1957—1966年间我国图书馆学家并未很好继承这些研究,他们对政治性、思想性问题的兴趣远远大于技术性问题。杜定友基于分类技术提出的图书分类法的路向问题,也很快变为政治批判的话题,成为一场理论闹剧。相比战后国际图书馆学,以阮冈纳赞为代表的图

书分类学家根据信息获取与组织对于图书分类的新要求,大大发展了图书分类的理论与实践。1952年出版的《冒号分类法》第4版中引入了方面分析、基本范畴等众多新的分类理论。1957年出版的《图书分类导论》第2版是图书分类学史上最著名的理论名著,奠定了现代图书分类学的基本原则和指导思想。这些研究成果,直到文革结束后才被刘国钧介绍过来。从国际比较结果看,这一时期我国图书分类法研究与世界的距离没有任何缩小,而是在扩大。

2 1973—1978:艰难的起步

中国图书馆学全面停滞发生于1966年,但实际上1958年以后学术界频频出现的各种非学术的批判,早已将理论家们的学术创新的热情与勇气消磨殆尽。刊登于图书馆学正式刊物上的对知名图书馆学家的点名批判,也是一块块无法抹平的历史伤疤。1964年《图书馆》(即今天的《中国图书馆学报》)的停刊,更是显现图书馆学界的非学术争斗的巨大破坏力。1966年文革运动开始,图书馆杂志普遍停刊,图书馆学教育也停顿多年,众多图书馆学家也被迫停止了理论研究。

文革造成的图书馆学全面停滞并没有延续到文革结束,而是自1973年起已经开始艰难起步。以1972年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的图书馆学系恢复招生为标志,图书馆学出现复苏起步的迹象。1972年中美关系改善使图书馆学受益匪浅,全面了解欧美图书馆学成为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等图书馆学主要研究单位的重要任务,一些介绍国外图书馆发展趋势的资料逐渐翻译印行,如刘国钧译《MARC款式详细说明书》。文革后期的图书馆学远远谈不上繁荣,非公开印行的图书馆学刊物中仍处处可见政治运动的口号和标语,经验描述仍是学术文章的常态,但优秀的研究者们已经回归了对于学术的敬重,1957—1966年间动辄点名批判,大帽子满天飞

的局面已经不复存在。

计算机应用是当时图书馆发展的重要契机,也是图书馆学重新起步的重要标志。1975年,刘国钧发表《马尔克计划简介—兼论图书馆引进电子计算机问题》,论文首次公开介绍美国国会图书馆 MARC 计划,特别是 MARC 格式,并对我国使用 MARC 和图书馆自动化问题进行了具有前瞻性的讨论。国际图书馆学正式采用计算机技术是在 1960 年代后期,标志性成果是 1969 年美国国会图书馆 MARC II 研发成功。刘国钧对 MARC 的关注表现出超凡的学术敏锐和学术责任,“表现出开放的视野与伟大的预见”^[9]。1975 年刘国钧对 MARC 的关注与研究,从中国图书馆学史的角度看是突破性的研究,从世界图书馆学角度看,则是大大缩小了中国图书馆学与国际图书馆学的时间距离。这一时期主题法研究进展也与计算机应用相关。1974 年国家“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即 748 工程启动。748 工程配套项目《汉语主题词表》同年开始编制,部分参与此项目的图书馆学家开始了新的理论工作。1976 年丘峰《主题法与分类法》发表。这篇论文回归检索层面讨论主题法和分类法的技术问题,表现出远超越我国以往图书分类研究的理论水准。

1976 年文革结束后,图书馆学并未立即走上正轨。部分学术刊物和学术论文中仍然有许多非学术成分。但代表我国图书馆学最高水准的一批论文却顽强地体现着学者们对于纯粹图书馆学的敬畏,如刘国钧《现代西方主要图书分类法评述》《用电子计算机编制图书目录的几个问题》、刘湘生《谈谈叙词表》等论文。

3 1979—1990:漫长的重建

1978 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社会管理者的价值取向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图书馆学终于摆脱了 1949—1978 年间非学术因素的困扰,进入一个全新的理论时代。文革前一代图书馆学人敢于否定自己耕耘数十年

的理论,文革后成长的新一代学人则成为经验图书馆学的最大冲击力。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中国图书馆学建成了基本具备现代社会科学特征,并具有与国际图书馆学对话能力的新图书馆学。1979 年复刊的《图书馆学通讯》,成为图书馆学理论重建的最主要见证者和参与者。该刊不但发表了一批激烈抨击经验图书馆学的高水平论文,而且在 1986 年以后的几个中青年学术会议上组织“会中会”,直接介入图书馆学重建的理论交锋之中。

图书馆学理论重建持续了整个 1980 年代,重建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经验图书馆学复苏、经验图书馆学批判和新型图书馆学建立。虽然重建过程中有过一些波折或争议,但图书馆学理论重建的趋势从未改变。

3.1 经验图书馆学重建

1978 年底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使图书馆学家们摆脱了研究中的非学术因素的困扰,图书馆学理论开始重建。重建之初图书馆学理论规模不大,高水平文章不多,但仍有不少亮点。基础理论领域,周文骏《图书馆工作的传递作用、体系和发展》从情报传递角度探索图书馆工作规律,提出了“传递图书情报是图书情报工作的核心”“现代化是图书馆工作发展的必由之路”^[10]等新观点,这一观点后来深化为周的“文献交流理论”。应用图书馆学领域,黄俊贵和阎立中关于中文图书著录标准化的研究关注并认同了西方文献著录标准化的理论与实践,他们的研究为我国图书馆计算机应用奠定了基础。杜克关于图书馆网的研究主张借鉴西方图书馆事业网和计算机检索网两个网络建设经验,其中关于图书馆事业网的研究介绍了西方建立图书馆总分馆和流动图书馆的经验^[11],可惜我国的总分馆建设在 20 多年后才真正走向实践。

1980 年定型的教材《图书馆学基础》就是人们重建经验图书馆学的产物。这部教材由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两校图书馆学优秀教师共同编写,清除了以往教材中许多非学术内容,并增加

了图书馆现代化等新的内容。但由于当时的图书馆学家们对西方图书馆学了解非常有限,教材没有吸收芝加哥学派对杜威图书馆学的批判与改造成果,将图书馆学理论体系局限于图书馆工作流程或要素。因此,尽管它形式上不同于以往的图书馆学基础教材,但从学术思想渊源及体系结构看,它仍属于经验图书馆学,其理论特征是对图书馆活动的经验描述,而不是对图书馆活动的社会背景或内在机理的更为本质的分析。

受到改革开放早期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乐观心态的影响,经验图书馆学重建被人们寄予太多的期望,给予太多的好评。但从国际图书馆学发展背景看,这一时期的研究并没有太多可以陈述的内容。

3.2 经验图书馆学批判

进入 1980 年代后,人们不再满足于恢复新图书馆运动时期或“十七年”的图书馆学,而是将视野投向更具现代科学的其他学科,以及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西方理论图书馆学。1982 年前后,人们对于经验图书馆学的不满开始加剧,由此形成一波对于经验图书馆学的批判。恢复高考后入学的一代人逐渐走上图书馆学舞台,也为这种批判带来新的力量。

中国经验图书馆学存在于图书馆学基础与应用图书馆学的各个学科,但对其批判主要发生在图书馆学基础领域。1981 年彭修义《关于开展“知识学”的研究的建议》批评大学图书馆学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薄弱,概论式课程令人沮丧,培养学生的方式误人子弟^[12]。彭修义的文章在《图书馆学研究》等刊物上引起强烈反响,金恩晖认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至今还没有从知识的总体上,从信息产生与交流的规律上,从这门科学的本质上,概括出(或曰抽象出)具有规律性的原理来”^[13]。1982 年邱昶、黄昕《论我国新时期的图书馆学研究》严厉批评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现状,指出我国图书馆学正处在“危机”和“革命”的交接处^[14]。随后沈继武、刘迅

《论我国图书馆学的危机及其革命》则将“危机说”进一步系统化^[15]。1985 年张晓林《应该转变图书馆研究的方向》指出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主要方向和内容一直是“图书馆的组织,工作内容和方法”,这种认识和实践“违背了认识事物的客观规律,严重地束缚了我们的视线和思维,也严重地限制了图书馆研究和图书馆工作本身的发展”^[16]。文章发表后,《图书馆学通讯》随即刊载了相应的讨论。主要学术刊物《图书馆学通讯》《图书馆学研究》的高调参与,使经验图书馆学批判达到了高峰。

1980 年代中国图书馆人对于经验图书馆学的批判,有些类似于 1930 年代芝加哥学派对于杜威经验图书馆学的批评。或者说,中国图书馆人终于完成了被长年的战争和政治运动打断了的图书馆学理论进阶过程。稍有遗憾的是,芝加哥学派的理论武器不仅有抽象化思维,还有源于田野研究的实证研究。而当时中国图书馆学仅仅继承了前者。

3.3 新型图书馆学建立

经验图书馆学的批判,导致图书馆学理论价值观和研究方法的变革,一种以现代科学精神为基本导向的新型图书馆学逐步建立起来。新图书馆学的建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在 1980 年代中后期,这一过程特别引人注目。1980 年代图书馆学科学思想的变革有四个理论特征:从经验描述到科学精神,从微观领域进入宏观领域,从批判式研究到建设式研究,理论格局从一元化走向多元化。在 1980 年代图书馆学的进步中,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文献资源建设和情报检索语言这三个研究领域的发展与变革最具有典型性。

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领域,学者们没有停留在对经验图书馆学的批评,或对于学科现状的抱怨,而是在多元化的理论格局中探索新的图书馆学理论基础和理论体系,走上了建设式图书馆学的道路。例如,1985 年宓浩、黄纯元发表《知识交流和交流的科学——关于图书馆学

基础理论的建设》，创建知识交流论。知识交流论认为“图书馆活动的本质应该是社会知识交流。在图书馆的知识交流过程中，读者是交流作用的对象，藏书是一种交流的媒介，图书馆员是交流的组织和中介者，图书馆内部的处理工作则可以理解为以交流为目的的知识整序过程”^[17]。宓浩等人还以知识交流论为框架编撰《图书馆学原理》，使知识交流论成为较完备的学说。

检索语言研究领域，图书分类曾是图书馆学中最具有技术含量的领域，但自从思想性问题讨论进入这一领域后，分类技术研究举步维艰。张琪玉等人提出“情报检索语言”取代图书分类，试图使图书分类研究摆脱非技术问题的纠缠，将图书分类理论纳入“以检索效率为中心”的纯技术领域。1984年《情报检索语言》的出版标志着这一领域的真正形成。从国际图书馆学横向比较看，尽管国外早有检索语言这一名词，但将检索语言作为一个完整的图书馆学分支学科来建设，中国人走的是自己的路。这也是新图书馆运动以来中国图书馆学学科理论创新的首次尝试。

文献资源建设领域，1984年肖自力撰文首次采用文献资源建设的概念，随后这一概念被理论界普遍认可。1988年“全国文献资源调查与布局研究”成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带动全国文献资源建设研究。1990年前后，该项目系列报告陆续在《图书馆学通讯》等刊物发表，将这一领域的研究推向高峰。从藏书建设到文献资源建设的发展是经验图书馆学发展到新图书馆学的一个缩影，文献资源建设概念的提出及研究领域的形成对中国图书馆学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在中国图书馆学史上，中国图书馆学家首次用自己的概念创立一个研究领域。

4 1991—2001：迷茫中破局

进入1990年代，迅猛前行的中国图书馆学似乎步入了十字路口。一方面，图书馆学博士

点建立，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图书馆学面上项目启动，《图书馆学通讯》改名《中国图书馆学报》，学科发展与变革的种种迹象，预示着中国图书馆学登上了新的台阶。另一方面，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推动中国市场化倾向，图书馆市场化的理论和实践给图书馆公益性原则带来世所罕见的挑战；市场化导致公众对图书馆的需求骤然降温，“经费紧张和‘知识贬值’使公共图书馆的发展跌入低谷”^[18]。以刘迅为代表的优秀图书馆学家出国、“下海”、转行，1980年代最富有朝气的一代学人几近腰斩。随着世纪之交的临近，图书馆学对自身现状与未来的认识变得更加迷茫。从学科理论史的角度看，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图书馆学史上最难把握的一个时期。

4.1 清理学科现状

1991—1993年间，理论界希望对1980年代迅速发展与变革的图书馆学进行梳理，以便更好地走向新世纪。1991年秋于庐山召开的全国基础理论讨论会对1980年代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发展取得了共识：“长期流行的经验描述已渐被摒弃，随之兴起的是逻辑的理性思辨。在构建图书馆学理论体系时，人们不再满足于经验要素的简单堆砌，而是追求一种内在的逻辑联系，促使图书馆学理论体系更趋合理、科学。”^[19]次年，刘迅、范并思延续庐山基础理论讨论会的话题，以《世纪之交的思考》为名发表了一组信函，提出了绘制图书馆学的学科地图以避免图书馆学步入各种理论误区的话题，“绘制学科地图即理论界对图书馆学理论的总清理，是世纪性的理论反思”^[20]。绘制学科地图也是21世纪国外图书馆学关注的学科建设任务，如2011年美国图书馆学家D.Lankes出版的《新图书馆学地图》。1993年发表的《从经验图书馆学到新型图书馆学》从图书馆学分支学科、理论特征和科学组织三个方面讨论1980年代图书馆学的发展与变革^[21]，给“清理学科现状”划上句号。

4.2 关于图书馆未来的对话

1991年中国承办62届IFLA大会的申请获批,经过5年精心筹备,1996年8月,主题为“变革的挑战、图书馆与经济发展”IFLA大会在北京召开。这届IFLA大会及会议前后各种学术交流,使中国图书馆理论界的国际交往变得空前频繁,但真正代表中国图书馆学国际化水平上台阶的学术成果,则是1995—1996年间吴建中《关于图书馆未来的对话》。这组对话包括吴建中与科林·史蒂尔、舒茨、帕特里西娅·沃德、竹内慈、韦伯、瓦拉莫夫、戈曼、盐见升、凯尼格等众多国际图书馆学家及张琪玉、侯汉清等国内图书馆学家的对话,内容涉及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图书馆未来)、公共图书馆服务、图书馆管理、图书馆学教育、图书馆信息化及检索语言等。这组对话表明中国图书馆学家敏锐地关注着国际图书馆学的最前沿,他们看到了“图书馆正经历着一场革命。在这场革命中,图书馆的每一个组成部分都在发生剧烈的变化”^[22],并严肃地思考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给图书馆学理论和图书馆服务带来的挑战。这组对话是中国图书馆学与国际图书馆学首次真正意义的大规模对话,它表明中国图书馆学已经走出了国外图书馆学文献译入/译出的底层次交流,是世纪之交的中国图书馆学国际交流登上新台阶的标志。

4.3 网络信息环境和数字图书馆技术

1990年代是网络信息环境迅速变化的年代,对图书馆学研究影响最大的则是数字图书馆的研发热潮。自美国“数字图书馆先导计划”启动后,我国数字图书馆研究从一般介绍到逐渐深入,从关注技术问题到关注数字图书馆涉及的各类问题。如汪冰关注的问题包括“数字图书馆的基本含义;数字图书馆对传统图书馆的影响;数字信息时代的信息识知能力;数字图书馆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如技术问题、版权问题、经济压力以及其他非技术因素”^[23]。当然数字图书馆研究对中国图书馆学的意义远不止

几篇论文或几个项目。1990年代后期的数字图书馆研发动员了大批图书馆人,包括理论界与实践界、专家与普通馆员、图书馆专业人员与非图书馆专业人员,来研究或关注图书馆的技术进步。在中国图书馆学历史上,对一项“技术”的如此大规模的关注是空前的,它改变了中国图书馆学的基本属性,使得关于技术问题的研究真正成为图书馆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5 2002—2016:新世纪的理论光辉

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图书馆学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时期。随着中国社会权利意识的苏醒,国家社会管理和文化管理政策逐渐回归公益,国家对于图书馆的管理水平和投入逐年增加。理论领域,新一代图书馆学家逐渐成长与成熟,成为图书馆学研究的中坚力量。实践领域,图书馆管理者对于理论的理解能力和应用能力大幅提升,带动图书馆管理与服务的不断创新。在经历了对国际图书馆学百年追赶,以及追赶过程中长达数十年的停滞与迷茫之后,中国图书馆学终于成为国际图书馆学大家庭中一名名副其实的的主要成员。

这一时期的理论研究在以下三个方面令人印象深刻。

5.1 图书馆服务理念的研究、宣传与应用

图书馆服务是专业化的服务,其重要特征就是在管理与服务中秉承这个职业的基本理念。这种职业理念源于公民文化权利,是图书馆行业对社会的基本承诺。在国际上,现代图书馆职业理念对于图书馆人几乎是不言而喻的存在。但在中国图书馆界,无论是新图书馆运动时期还是1980年代图书馆学重建时期,理论家们都没有真正研究与认识它。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1990年代图书馆服务理念的扭曲。

2002年李国新发表《对“图书馆自由”的理论思考》,通过对美国《图书馆权利宣言》和日本《图书馆自由宣言》的系统讨论和背景分析,阐

明了“公众自由利用图书馆是一种‘权利’”的观点^[24]。随后关于图书馆权利的研究逐渐升温,2005年中国图书馆学会首次“新年峰会”,将此议题作为首个议题,《图书馆建设》开辟了“走向权利时代”的专栏。与图书馆权利研究并进的是公共图书馆精神的研究,2002年范并思从研究公共图书馆制度的角度讨论了公共图书馆作为一种社会信息保障制度保障公民获取知识或信息的权利的问题,2004年《公共图书馆精神的时代辩护》更系统阐明了这一观点:公共图书馆是一种社会知识或信息保障的制度,它的存在使公民具备了自由获取知识或信息的权利^[25]。

自2005年起,在图书馆权利和公共图书馆精神研究的基础上,理论界热烈地讨论现代图书馆服务的理念问题,涉及的问题有普遍服务和平等服务(免费服务)、延伸服务(包括服务体系建设和总分馆服务)、人性化服务、信息公平和信息保障,等等。至2008年中国图书馆学会《图书馆服务宣言》发布,宣告“中国图书馆人经过不懈的追求与努力,逐步确立了对社会普遍开放、平等服务、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26],现代图书馆服务理念的重建工作基本完成。

新世纪中国图书馆学家对图书馆服务理念问题的研究,表面上看仅仅是中国图书馆人对国际图书馆学的追赶的继续,是对以往图书馆学理论不足的补课,但实质上这一研究具有非凡的意义。新世纪中国图书馆人对于现代图书馆理念的研究,使图书馆权利、信息公平、智识自由等现代图书馆学最为重要的命题成为中国图书馆学的流行话题,使社会政治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研究进入图书馆学研究的主流位置。更重要的是,关于普遍开放、公平服务、免费服务、总分馆服务等领域的研究成果的应用,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公共图书馆政策、管理与服务的变革,推动了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跨越式发展。

5.2 在图书馆学前沿进行全方位的探索

2000年前后互联网的发展遭遇“冬天”,数字图书馆研发也遭遇瓶颈。但自2004年起,信

息技术的发展进入新一轮发展时期。Web 2.0、云计算、移动技术、智慧技术(物联网)、大数据,一波又一波的新技术浪潮,为图书馆信息服务的升级发展开辟了新的空间。同时,由于信息技术给图书馆服务带来的持续挑战,图书馆人积极研究与图书馆管理、资源和服务相关的新问题,不断开辟新的理论范畴或领域。在新世纪图书馆的服务创新与新技术应用研究中,中国图书馆学不再是跟风追赶者的角色,而是积极参与新领域的理论研究,成为国际图书馆学前沿领域研究的重要成员。

在图书馆新技术应用领域,中国图书馆学紧跟图书馆学最前沿,积极研究元数据、图书馆2.0(及新一代图书馆集成系统、新型图书馆网络服务)、关联数据、RDA、BibFrame等图书馆技术前沿,也略有超前地关注着云计算、移动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等影响图书馆信息环境的新技术应用。在新技术应用中,中国图书馆学家不但关注已经应用到图书馆领域,“对现有能力和机制起着增强作用的技术与方法”,还“高度关注那些可能对我们所熟悉的能力和机制进行破坏和颠覆的重大趋势”^[27]。在图书馆管理与服务领域,中国图书馆学研究了几乎所有国际图书馆学的前沿问题,如图书馆核心价值、图书馆社会包容、信息素养教育、开放获取、图书馆绩效评估、图书馆空间改造(包括创客空间)、图书馆营销、新型阅读服务(以活动化服务为主要特征的阅读服务),等等。

这一时期的理论研究不再是一直跟随国际图书馆进行消化吸收,而是在学习的基础上,逐步产生了一些领先于西方图书馆学的研究成果。如图书馆2.0的概念首先产生于西方,但国内《图书馆2.0:构建新的图书馆服务》比国外学术期刊刊发的首篇同主题论文《图书馆2.0:新一代的图书馆服务》早8个月发表,论文质量也优于后者。“阅读推广”一词在西方并非学理化的概念,中国图书馆学界将这一术语作为图书馆新型阅读服务的统称,对其定义、范畴、类型、性质及其他基础理论问题进行研究,《中国图书

馆学报》等期刊发表的阅读推广基础理论论文,从理论上对“阅读推广”概念进行梳理和澄清,确立图书馆阅读推广的真正内涵,“提出了图书馆阅读推广理论所应包含的内容和基本的体系架构”,“构建图书馆阅读推广理论体系”^[28]。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人培训教材中也出现了《图书馆阅读推广基础理论》。相比我国图书馆学已经进入图书馆阅读推广的认识问题和价值观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至今西方图书馆学对阅读推广的关注还基本停留在案例、调研等经验研究的层面,阅读推广的概念使用混乱,具有理论意义的研究十分难觅。

中国图书馆学全面参与国际图书馆学,还可以从更多方面表现出来。IFLA 官网上中文文档越来越多,文档译出也越来越及时。IFLA、ALA 的年会和各种图书馆专业会议上,中国图书馆专家参会做报告越来越频繁。图书馆营销这样新的领域中,清华大学图书馆和厦门大学图书馆也能积极参与并获得 IFLA 国际营销大奖。

5.3 图书馆学会成为理论研究的直接推动者

图书馆行业组织和期刊对图书馆理论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1876 年美国图书馆协会成立和《图书馆杂志》创刊,使美国图书馆学开始走在世界的前列。我国图书馆的行业组织始建于 1925 年,但其成立没有改变图书馆学自发研究的状况。1956 年我国开始重新筹建中国图书馆学会未果,当时几个重要学术会议是高校的“五四科学讨论会”。1980—1990 年代,虽然中国图书馆学会的某些专业委员会也组织过学术活动,但大学图书馆学院系对理论研究的推动更大。如 1980 年代的“全国图书馆学中青年理论研讨会”,1990 年代的“海峡两岸图书馆学教育研讨会”,这些影响很大的系列会议,都是在各高校图书馆学院系轮流召开的。

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图书馆学会创造了一种与发达国家图书馆协会更为接近的工作模式,通过直接组织学术活动,引领图书馆行业参

与理论研究。中国图书馆学会直接组织的学术会议和学术活动,成为新世纪图书馆学的强大引擎。2004 年中国图书馆学年会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中国图书馆学会借纪念中国图书馆百年,将会议的主题确定为“百年图书馆精神”。并通过一系列学术报告,使会议成为理论界称之为“重续图书馆精神的历史链条”的会议。此后,图书馆年会一直是国内图书馆界最有影响的学术活动,近年来年会的预告还能登上 IFLA 官网,显示出较强的国际影响力。2005 年开始中国图书馆学会连续组织“新年峰会”,会议超前地拟定当年重要学术议题,如图书馆权利、图书馆核心价值、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等问题,都是新年峰会引发的重要理论议题。中国图书馆学会创立的两年一届的青年论坛和百县馆长论坛也是引领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的会议,如百县馆长论坛“使得‘县级图书馆’这个长期被学术研究忽视的对象由此而引起了关注,为理论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29]。除会议之外,中国图书馆学会还组织了许多影响深远的活动。如基层图书馆培训“志愿者行动”,组织了上百人次的专家教授,连续 5 年在全国各地对基层图书馆管理者宣讲先进的图书馆管理与服务理念,对基层图书馆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次志愿者行动持续时间长、覆盖图书馆范围大、参与者人数多,在国际图书馆界并无先例。中国图书馆学会自 2005 年以来促进阅读推广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是中国图书馆阅读推广理论与实践能够走在国际前沿的重要因素。

6 结语:期待理论输出

国际图书馆学界对于走向 2020 年有着很高的期待,在部分中国图书馆学的论文或报告中,对 2020 年的展望也开始出现。今天的中国图书馆事业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平,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导致图书馆的规模急剧扩张,信息技术应用促使图书馆服务能力的提升,新型阅读服务不断创新图书馆的服务形态。

与之相对应,新世纪的中国图书馆学也产生了一批具有国际水准的研究成果,有些成果甚至大大超出国际水平。那么,对于正在走向 2020 年的中国图书馆学,我们将有什么样的期望?

今天的中国图书馆学仍然未能真正走向国门。即使中国图书馆学家在英文学术刊物发文或在国际学术会议发言,一般还是事业调研、技

术应用、资源与服务的介绍。今天的中国图书馆学,优秀的研究成果缺乏走向国门的勇气与自信,因而未能对国际图书馆学输出理论、思想或观念。因此,我期待走向 2020 年的中国图书馆学能够出现更加国际化的理论新人,完善理论输出的机制,使中国图书馆学真正成为国际图书馆学大家庭中有理论担当的成员。

参考文献

- [1] 张遵俭. 杜威十进分类法第十六版修订情况[J]. 图书馆学通讯, 1957(4-5): 99-100. (Zhang Zunjian. A summary of revision of DDC (16 ed) [J]. Bulletin of the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 1957 (4-5): 99-100.)
- [2] 毛坤. 试论联合目录[J]. 图书馆学通讯, 1957(6): 1-6. (Mao Kun. On the union catalog [J]. Bulletin of the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 1957 (6): 1-6.)
- [3] 邓衍林. 编制联合目录的几个基本问题[J]. 图书馆学通讯, 1957(6): 7-12. (Deng Yanlin. Several basic problems in compiling union catalog [J]. Bulletin of the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 1957 (6): 7-12.)
- [4] 杜定友. 图书分类法意见[J]. 文物参考资料, 1951(2): 57-60. (Du Dingyou. Opinion on the library classification [J]. Cultural Relic Reference, 1951(2): 57-60.)
- [5] 张德芳. 论编制图书分类法的基本原则[J]. 图书馆学通讯, 1957(2): 13-16. (Zhang Defang. On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compiling library classification [J]. Bulletin of the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 1957 (2): 13-16.)
- [6] 汪家熔. 同类图书排列的若干问题[J]. 图书馆学通讯, 1958(4): 43-45. (Wang Jiarong. Some problems on the arrangement of similar books [J]. Bulletin of the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 1958 (4): 43-45.)
- [7] 毛坤. 标题目录和科学研究[J]. 图书馆学通讯, 1957(2): 22-25. (Mao Kun. Title catalo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J]. Bulletin of the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 1957(2): 22-25.)
- [8] 杜定友. 图书分类法的路向[J]. 图书馆, 1962(2): 26-28. (Du Dingyou.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library classification [J]. Library, 1962 (2): 26-28.)
- [9] 王子舟. 图书馆学基础教程[M].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3: 48. (Wang Zizhou.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Science [M]. Wuhan: Wuhan University Press, 2003: 120-124.)
- [10] 周文骏. 图书馆工作的传递作用、体系和发展[J]. 图书馆学通讯, 1979(1): 41-46. (Zhou Wenjun. The transmitting function, system and development of librarianship [J]. Bulletin of the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 1979(1): 41-46.)
- [11] 杜克. 我国图书馆网建设初探[J]. 图书馆学通讯, 1979(1): 22-26. (Du Ke. On building of library network in China [J]. Bulletin of the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 1979(1): 22-26.)
- [12] 彭修义. 关于开展“知识学”的研究的建议[J]. 图书馆学通讯, 1981(1): 85-88. (Peng Xiuyi. Suggestion on the study of knowledge science [J]. Bulletin of the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 1981(1): 85-88.)
- [13] 金恩晖. 金恩晖同志致彭修义同志信[J]. 图书馆学研究, 1982(5): 122-123. (Jin Enhui. A letter to Peng Xiuyi [J]. Research in Library Science, 1982(5): 122-123.)
- [14] 邱昶, 黄昕. 论我国新时期的图书馆学研究[J]. 图书馆学通讯, 1982(1): 31-39. (Qiu Chang, Huang Xin. On the study of Library Science in the new times of China [J]. Bulletin of the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

- 1982(1):31-39.)
- [15] 沈继武,刘迅.论我国图书馆学的危机及其革命[J].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5):76-81,68.
(Shen Jiwu,Liu Xun. On the crisis and its revolution of Chinese Library Science [J]. Journal of Wuhan University: Humanities, 1982(5): 76-81, 68.)
- [16] 张晓林.应该转变图书馆研究的方向[J].图书馆学通讯,1985(3):57-64.(Zhang Xiaolin. On change the direction of library research [J]. Bulletin of the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 1985(3): 57-64.)
- [17] 黄纯元.追问知识的本质——对知识交流论的再思考[J].图书馆杂志(理论学术年刊),1998:1-24.
(Huang Chunyuan. Questioning the essence of knowledge; study again on the theory of knowledge communication [J]. Library Journal: Theoretical Academic Annual, 1998: 1-24.)
- [18] 刘喜申.公共图书馆:繁荣与危机[J].图书馆学通讯,1990(2):17-22.(Liu Xisheng. Public library: prosperity and crisis [J]. Bulletin of the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 1990(2): 17-22.)
- [19] 吴慰慈.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讨会述要[J].中国图书馆学报,1992(1):82,59.(Wu Weici. A summary of the basic theory seminar of Library Science [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1992(1): 82, 59.)
- [20] 刘迅,范并思.世纪之交的思考(一)[J].图书馆,1992(3):36-39.(Liu Xun, Fan Bingsi. Thinking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1) [J]. Library, 1992(3): 36-39.)
- [21] 范并思.从经验图书馆学到新型图书馆学[J].中国图书馆学报,1993(2):3-10.(Fan Bingsi. From the experience Library Science to the new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1993(2): 3-10.)
- [22] 吴建中,科林·史蒂尔.关于图书馆未来的对话[J].图书馆杂志,1995(3):32-34.(Wu Jianzhong, Steele C R. A dialogue on the future of libraries [J]. Library Journal, 1995(3): 32-34.)
- [23] 汪冰.数字图书馆:定义、影响和相关问题[J].中国图书馆学报,1998(6):9-17.(Wang Bing. Digital library: definition, impact and related issues [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1998(6): 9-17.)
- [24] 李国新.对“图书馆自由”的理论思考[J].图书馆,2002(1):16-21.(Li Guoxin. A few opinions on the theory of the freedom of library [J]. Library, 2002(1): 16-21.)
- [25] 范并思.公共图书馆精神的时代辩护[J].中国图书馆学报,2004(2):5-11.(Fan Bingsi. A modern defense of the spirit of public library [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04(2): 5-11.)
- [26] 中国图书馆学会.图书馆服务宣言[J].中国图书馆学报,2008(6):5.(Library Society of China. Library service manifesto [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08(6): 5.)
- [27] 张晓林.颠覆数字图书馆的大趋势[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1(5):4-12.(Zhang Xiaolin. The trends that will disrupt digital libraries [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11(5): 4-12.)
- [28] 谢蓉,刘炜,赵珊珊.试论图书馆阅读推广理论的构建[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5(5):87-98.(Xie Rong, Liu Wei, Zhao Shanshan. On the construction of library's reading promotion theory [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15(5): 87-98.)
- [29] 李超平.“百县馆长论坛”的历史意义.中国图书馆学报,2013(2):27-35.(Li Chaoping. The historical meaning of the China County Librarian Forum [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13(2): 27-35.)

范并思 华东师范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上海 200062。

(收稿日期:2016-10-24)